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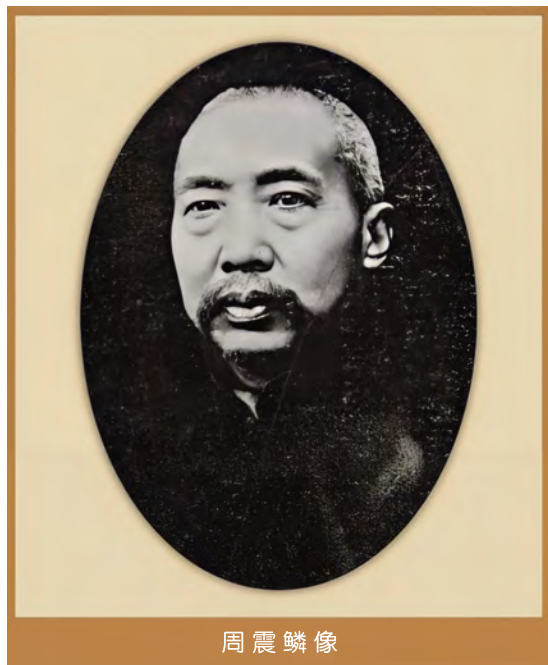
第一节 修业学堂初（1903—1912）

甲午之战后，从戊戌到新政，湖南教育救国呼声既浓，办学风气高涨，至变法失败，转而革命，湖南始终走在前列。修业学堂的创办，正是这一革命大潮中的产儿。

一、热血青年，革命建校

20 世纪初年，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维新人士对改革的呼声，虽已时过境迁，但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为挽救国运，振兴中华，湖南各界的救国热诚却依然一浪高过一浪。为此，湖南教育界及其他各界的有识之士苦苦求索，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进行教育改革，湖南后发先至，各种新式学堂办得颇有成效、颇有特色，在全国声誉鹊起，在当时颇受国人瞩目。他们积极宣传和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主张，其中以军国民教育思想、实业教育思想、国民教育思想为代表，相互激荡，汇成一股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喜好变革创新，心怀天下，对时局及关系生存之事常以特殊方式加以表达，不时掀起风潮和运动，这既反映了年轻学生的叛逆性情和躁动不安的心态，又是辛亥革命大潮中民主、自由和平等意识宣传和萌生的体现。

加上湖南学风本一直存在一股明显的经世致用传统，近代教育也因此蕴含着一种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湖南教育界的诸多有识之士，大多主张“学与政兼”，他们不主张学生读死书，认为学生在校不能只学习文化知识，更要求学生关心国事，投身救国的革命洪流与风潮中去。故从晚清到民国，湖南众多的新式学校成为各种新思想与新思潮流传的场地，也成为新旧势力激烈交锋的战场。对此教育精神与风格，民国时期就有人进



周震鳞像

行过明确的赞扬与总结：“自清末以至于今日，湖南尚有一种坚贞永毅之精神，始终与革命运动相辅以行，此即湖南教育界之精神。40 年间，如胡元倌之于明德中学，陈凤荒之于楚怡工校，彭国钧之于修业农校，曹籽谷之于文艺中学，……以及教育行政方面之余先砺、周调阳、夏开权等，皆以母鸡孵蛋之精神，维护学校，培育后进，不入仕途，不竞名利，数十年如一日，匪独教学，抑且领导社会，反专制、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相蔚成风，始终作动荡中的中流砥柱，此为湖南教育界特有之光荣传统，弥足珍贵者。”^[1]

正是在这种“学与政兼”的革命教育风潮中，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3 月胡元倌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初设中学部，6 月增设速成师范班，由黄兴主持。胡、黄系日本宏文书院同学，两人均抱教育救国

志。在黄兴影响下，明德学堂成为华兴会的策源地，革命思潮启迪并武装起明德中学的进步师生，明德中学内部局势急剧变化。其中进步青年教师周震鳞与刘佐辑不悛，刘佐辑向政府密告进步学生言行。学生王桢干、郭琮翰、许推、李著勋、廖家望、魏先根、何积焱、梅伟杰、彭鼎年、黄昌浚、周教敷、张尔遗等 12 人不直刘之所为，愤而退学。为便于从事革命活动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周震鳞倡议另组“修业学堂”。公推周震鳞为监督，周震鳞、俞经治、许玉屏为总办，校内诸事则由 12 位青年学生分理。又有黄陂许奎垣、贵阳朱子陶、宁乡钱硕人等多位先生来校任教员。许玉屏先生捐资百金，租得长沙城南高家码头民房为校舍，定于 10 月 8 日（农历八月十八日）正式开学。同年冬，经朱剑帆先生介绍，其亲戚魏子骥先生捐银 400 两，改租五堆子民房为校舍^②。这所由革命青年学生自己组织筹办的学校——湖南省私立修业学堂，由此便宣告诞生。



在那政治腐败，民族危亡的历史年代，修业以“救国帜志”为己任，一批批富于革命思想的有志之士，创办学校宣传革命思想，修业学堂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聚会之所，自然形成学校浓厚的爱国氛围。1903 年 11 月，黄兴、宋教仁、周震鳞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宣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主张革命排满，筹备起义活动。更有徐特立在校断指血书，震动湖南学界。1909 年（清宣统元年），湖南为铁路国有问题派代表前往北京促开国会，以救危急，清廷却顽固拒绝，结果尽失民心。12 月 8 日（阴历 10 月 26 日），修业师生在校开会，校董兼教员徐特立向全校师生讲演国事，声泪俱下，越讲越悲愤，便从厨房取来菜刀，当场自断左手小指，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 个大字，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流血不止，他当场晕倒。当时的校长彭国钧为保护徐老，情急智生，持断指代书“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于手帕，急与教员姜济寰送赴京代表栗戡时^③。栗戡时将之在十六省代表面前展示出来，阴赤淋漓，众咸感泣，感召一时。事后，省内外许多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以后董必武还为此赠诗徐老，赞他“救亡存断指，入党在危时”，传为美谈。斯诺也曾

在《西行漫记》中对此事加以专门记载。可以说，是修

二、践行军国民教育

此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立宪改制、革命排满，风起云涌，这不能不影响到修业的办学。因为黄兴的强调，军国民教育思想在修业办学中得以集中体现。黄兴作为“军国民教育会”的主要发起人与组织者，力主军国民教育。所谓军国民教育，就是要在学校教育的各门课程中，强调向学生进行军事知识方面的教育与军事体育训练，养成爱国、尚武精神。当时的湖南深受军国民教育思想影响。乃至以后的毛泽东在他的《体育之研究》中就明确宣称德智体，体育居第一，他认为：“一旦身之不存，德智随之隳矣”，“无体是无德智”。修业学堂开学后，黄兴即亲自执教体操课。以后修业还聘请新民学会会员、湖南早期体育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的李惠迪执掌学校体育课。

业学堂创业的艰苦岁月，辛亥革命的疾风暴雨，更兼黄兴、徐特立、周震麟等人言传身教，造就了当时热血青年学生追求进步，从忧国忧民，到救国救民，爱国传统，一代一代，星火相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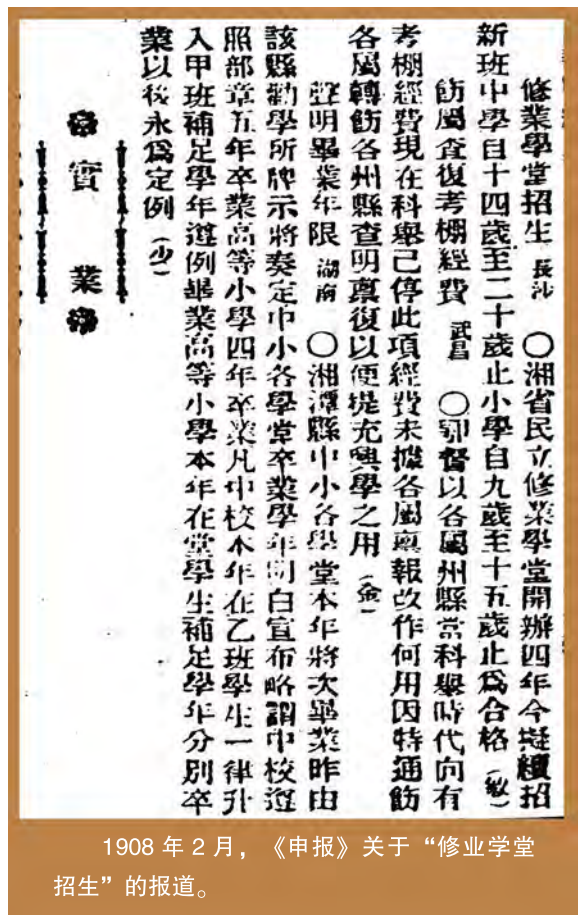
修业学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办学宗旨由此更加明确，革命意志更加坚定。正如《本校附属小学教育研究会章程》所指出：小学人才培养目标是使学生“养成礼义廉耻的观念，爱国爱群的思想。”又正如修业学堂校歌中所唱：“本革命之情绪，十二人独立经营，真自治，都服从。”这是修业学堂自创始时期就非常明确的方向和一贯遵循的办学原则。正是这种原则和精神为苦难的中华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砥柱中流的社会中坚和革命者。1904年2月和1905年2月，王桢干、郭琮翰、许推、魏先根、彭鼎年、廖家铨、梅伟杰、何积焱、黄昌浚、周教敷等10人先后留学东洋，他们作为修业学

堂的创始人，也是修业学堂的第一期学生，后来都成为同盟会会员和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还有辜天佑、曹孟其上书抚院为民请命。修业创办人之一黄昌浚和彭怡舫等为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而在校密制炸弹。1911年，湖南首先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学校师生纷纷参加辛亥革命活动，停课数月。

三、“修业叫化”，众志成城

1903年10月8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八日），修业学堂正式开学，周震麟出任第一任校长，学校性质为私办公助。建校之初，只有中学部，条件异常艰苦。从1903年到1912年的9年间，学校校舍多为租赁民房，先后由城南高家码头至五堆子、肇家坪、水风井、福星街、浏正街、马王街，九年凡七迁^④。其办学之艰，实在难以想象。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8月，肇家坪“敬业小学”停办，主办人杨德吾先生捐房租银480元，接办“敬业小学”，修业始设小学部，周震麟聘清明德师范毕业生彭翰徽担任第一任堂长，当年即招收小学高等和初等各一班学生，当时称为两等小学，相当于现在的完全小学，这是修业学堂附属小学的最初基业。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王桢干回国任修业学堂监督。2月，以第一名成绩从明德毕业的彭国钧应周震麟邀请来修业学堂小学部任教，并自此与修业结下了毕生的不解之缘。这年，中学部迁址水风井胡家花园，添加中学两班，郭琮翰、许推、魏先根、彭鼎年、廖家均、梅伟杰、何积焱、周教敷、黄昌浚9人奉派赴日本留学。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月，修业学堂租福星街黄祠西偏房为校舍，开办速成师范两班，增招中学预科一班，办学规模开始扩大，学生数迅速由几十人发展至300余人。此后，修业因为经费困难，其间中学、师范时办时停，只有小学部一直没有停止过。即使是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政府补助费停发，修业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其它各部一律停办，小学部也坚持下



1908年2月，《申报》关于“修业学堂招生”的报道。



修业学校董事全体摄影

1912年7月,“修业学校校董会”成立。第一届董事有周震鳞、郭琮翰、王桢干、许推、彭国钧、徐特立、梅伟杰、彭鼎年、魏先根、周教敷、黄昌浚、何积琅、朱剑凡、俞蕃馥、黄海润、辜天佑、力孝仪、姜济寰、王经武、王震东、狄昂人等21人。校董会的成立,是修业学校发展国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织保证。

来。这一年,明德师范毕业生彭国钧受聘担任修业小学部堂长(即校长),俞经治、黄海润、姜济寰、徐特立、狄昂人等依然在此任教员,勉力撑持。此后二三年间修业学堂经费纯赖俞经治先生多方借贷,独立支持,学校环境极艰,堂长以次概不支薪。小学部迁移福星街与速成师范并在一处,校舍简陋,房屋湫隘,天雨水深盈尺,师生经常赤足撑伞上课。甚至至于,学校还常无隔夜之粮,有赖师生典衣为炊^[1]。故当时社会上有所谓“叫化修业”“贵族明德”之谑言。可贫穷与谑言不仅没能动摇师生办学求学的决心,反而激发了师生愈穷愈振的斗志和乐观精神。即使学校面临倒闭之窘境,教职员也热心任事,一人兼数职,辄更深阅课卷,黎明又起工,亦皆精神焕发,无不安贫乐教,课余每弦歌不断,置艰难困苦、饥寒交迫于度外。校董兼教员徐特立,一生勤俭朴实,艰苦卓绝,以身作则。他在修业任教期间,城乡往返80余里,总是步行,从不乘轿。学生有困难者,他总是解囊相助。徐老的勤俭作风,是为全校楷模。正是这种不畏艰难的斗志与精神,吸引了有如钱维骥、朱子陶、田震勋等众先生自愿不要分文来修业任教,也令以后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为之感慨动容,挥笔题词曰:“缔造艰难!”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周震鳞避谤北上,彭国钧受托于危难之际,接任修业学堂监督,并以监督身

份联络革命党人,掩护地下活动。他在修业制校歌,校歌曰:“猗歟修业,创自癸卯秋分。本革命之情绪,十二人独立经营,真自治,都服从。年长学生,半耕半读,愈穷愈振;我后起,齐努力,当记取创造的精神,当记取自治的精神。”^[2]“愈穷愈振”作为校歌的关键词之一,不仅激发了一代代修业学子向贫困进军的昂扬斗志,而且铸就了后辈继往开来、百折不挠的坚强品性。作为校长,彭国钧还以身作则,亲自带领学生半耕半读。为筹措办学经费,彭国钧四处奔波,在他的努力下,这一年湖南学署终于拨补助费银1600两。修业学堂租浏正街民房为校舍,复办中学部,并添招小学一班。1910年(清宣统二年)租马王街马王庙房屋(即今桂花井地址)为小学部校舍。1911年(清宣统三年),又于马王庙后建板房4间为教室,中学部迁聚一起。这样,修业全体师生本着艰苦朴素的优良校风,众志成城,终于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注:

- [1]周秋光.论湖南近代教育的起点、进程、特点及其作用(J).当代教育论坛,2003(1):75-80.
- [2]《修业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之《本校史略》。
- [3]《长沙晚报》1989年12月24日。
- [4]《修业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之《本校农科沿革》。
- [5]《修业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之《本校农科沿革》。
- [6]《修业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